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經由西方人所引入的文化，著實給中國各方面帶來深遠的影響。清代與中國往來的西方國家，大致循著海上的路線與中國接觸。他們多半是基於商業的目的而從事拓展。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發生了鴉片戰爭後，始有較多要求。但是循著陸地東來，與中國接觸的俄國人，早在十七世紀中期就展現出擴張領土的野心。肇始於滿人的發祥地，黑龍江流域一帶受到俄人侵擾，其攻佔雅克薩城而據以東侵，時在清順治九年（A.D 1625），此為近代中俄衝突的開始¹。往後歷經康、雍、乾三朝，中俄雙方在通商、盟聘、以及關於邊界等問題上均有接觸，此一時期清帝國正值盛世，尚能以武力作為後盾而驅逐俄羅斯人，且俄羅斯的統治者此時亦以與歐洲國家學習、競爭為主，因此東進的範圍主在西伯利亞地區，以及與中國通商。但進入了十九世紀後期，中俄關係始產生較多的轉變。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5）中失利而將擴張目標轉向東方的俄國，則利用中國官方對國際事務的無知與內憂外患的發生，讓清廷在領土以及相關利權上蒙受很大的損失，最顯著的當然是中國東北、西北疆大片的領土被俄人佔有，以及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眾多利權的喪失。延伸到民國成立後，其對中國的政治發展仍有鉅大的影響。

身為現代人的我們尚且對這段歷史發展感到影響重大，特別是在領土喪失的部份。回顧百餘年前，清帝國的知識份子²是否也發現到，這個來自北方寒地的龐然大國，縱然在盛清的皇帝應對得宜之下蟄伏一世紀以上，且「遠處邊

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41），頁 4。關於中俄早期接觸的詳細戰爭情形與外交折衝可參考此書第二段，關於研究回顧部份。

² 「知識份子」的定義，詳見第一章。

陞，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至，亦見慕義之忱」³，但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卻成為許多知識份子認識中，不得不防的心腹大患⁴，相對於朝廷上下致力於翻譯與引進以西歐國家文化為主流的各項技術與知識，力圖從「以夷制夷」的方法抗拒外人的入侵，那麼知識份子對於同是異邦，與中國的接觸已久的俄國有怎樣的看法，他們對俄羅斯的基本認識是否受到舊有的地理觀念與歷史觀念的影響，同時知識份子認識俄羅斯的管道是什麼？他們認識的方向為何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有著不同的面貌，其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什麼，是本論文所要討論的課題。同時，如果我們重視在中國近代史上，因為對俄國的外交政策所出現的多次嚴重失誤，並承認其帶來的深遠影響的話，那更有必要對清代，特別是在中西文化衝突的十九世紀中後期，知識份子如何去認識俄羅斯這個國家的內涵予以研究，此亦論文寫作之另一旨趣，當然更希望能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有一些新的貢獻。

二、研究回顧

有關清代知識分子對俄羅斯認識的相關研究，在近數十年來並非為熱門的研究課題，雖然有許多前輩對中俄相關領域有很好的研究，但是有關筆者論述的部分卻是著墨較少的，因此研究回顧僅能從有關中俄關係的專書、論文等著作著手，將有關研究十九世紀中國與俄國接觸概況的梗概作一釐清，並且說明本論文所要加的研究。

研究清代中俄之間往來的主要範圍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通論性之專著

³ 何秋濤輯，《朔方備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首11，頁104。

⁴ 最早在林則徐因鴉片戰爭而謫居至新疆期間，即觀察到俄羅斯對中國的威脅，而認為，對抗英國容易，然而對俄國“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林文忠公事略，卷25，總頁1237。

2.中俄疆域問題

3.中俄外交問題

(一) 通論專著

在通論專著部分，大多是從俄國與中國的接觸開始說起，並延伸到 20 世紀的發展。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吳相湘《帝俄侵略中國史》(臺北：正中書局，1973)、李齊芳《中俄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劉民聲、孟憲章、步平等編寫之《十七世紀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復旦大學所編寫之《沙俄侵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俄帝侵略中國簡史》，起自俄人在十五世紀末的犯邊，迄於毛澤東與史達林在 1949 年所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對於甲午戰爭前的中俄關係，多以重大的條約簽訂為主軸而論述，可將之視為認識中俄關係的簡要著作。《帝俄侵略中國史》，目的「為近三百年來俄羅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實之綜合敘述，除注重俄人侵略企圖行動外，更注意於我國對侵略者之方策，以及當時朝野人士之言論，與當時國際環境」⁵，且全書對俄國侵略及中俄交涉的部分都有詳細的評述。

《中俄關係史》，論述的時間範圍從十七世紀中俄的接觸開始，一直到日俄戰爭結束以後，日俄密約的締結過程。章節架構是以中俄接觸以來重要史事作為探討重點，包括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前的中俄接觸情形、尼布楚條約商訂的過程、雍正皇帝在位時，俄國遣使來華商議通商傳教，簽訂恰克圖條約的過程以及俄國東正教在華的活動，中俄璦琿、天津、北京條約的簽訂，同時期西北邊疆的伊犁問題與交涉過程，最後則是對於日俄戰爭以後，日俄雙方為劃分彼此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所簽訂的日俄密約的過程，是《中俄關係史》較為重要的部分。作者在第一章將有助中俄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加以整理，其中有

⁵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臺北：正中書局，1973)，例言。

許多是輿地類的著述與圖志、外交官員與俄人接觸以後所呈之奏稿、私人文集，或是在 1949 年以前的對中俄關係研究的論著予以收錄，以陳復光、何漢文、魯鴻深等人的著作為重要，另外也收錄了有關中俄兩國疆域、外交方面的論文；西文資料方面，關於俄、英、法、日等不同語文的史料以及相關著作，也都有列出，這對於研究中俄關係卻不知從何種史料下手的研究者來說，實為一大幫助。

在大陸方面，由復旦大學所編寫的《沙俄侵華史》，也是一本從早期沙俄向東方擴張作為起點，論述尼布楚約、兩次英法聯軍之間利用條約的侵略、以及俄國陸續以勘界為手段掠奪新疆、東北地區，和日俄戰爭後俄國對東北及蒙古的侵略等史事的專書。其中在第三章，除了關於從早期俄國對中國西北疆的侵略的論述外，另外以「農奴改革制度時期」(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期間)為背景，來看俄國基於發展經濟，獲取棉花資源的目的而侵略中亞、新疆地區⁶；第四、五章，是談俄國一方面誘使中國在甲午戰爭後與其簽訂中俄密約，另一方面又使用外交手段與法國、德國聯合調停中、日的衝突，並與日本議商彼此在東北的利益。而東北地區在俄國勢力進入以後，東北人民又如何進行抵抗活動的論述都在此二章有相關論述；最後在外文參考書籍的部分，更巨細靡遺的列出英、法、俄、德等外文參考史料，由原書名與中譯對照，也可看出編寫者之用心。編輯自 1640 至 1680 年間俄國對黑龍江流域侵略的相關資料的《十七世紀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史資料》，研究在四十年間沙俄侵略黑龍江的時間表與事件，對資料進行編纂。前面八章主要是論述俄羅斯人最初向黑龍江流域的探險過程，到第二次雅克薩戰爭結束為止。第二部份，在第九、十章則是談到有關 尼布楚條約 的談判過程；與其他著作相比較，《十七世紀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史資料》的內容偏重於一手史料的記載，作者在論述的觀點的份量雖然較少，不過其貢獻處則在於提供相當完整的史料，甚有裨於後續的研究。

⁶ 復旦大學歷史系，《沙俄侵華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頁 156。

（二）疆域研究的部份

疆域研究，在對清代中俄關係研究成果所佔的比重相當高，這自然與俄國在華活動的目的有關。更何況中俄國界綿延兩千餘公里，多是草原、森林、河流夾雜其中，不易做明顯的界限劃定，因而在多次交涉事件中多以界限劃定為主要目標；另外一方面，俄國為了將其勢力延伸至西太平洋，以解開在歐洲無法伸展海上勢力的侷限，其遠東政策即在於以擴張領土的方式達成，十九世紀中葉正逢清帝國衰弱，來自海上的帝國主義者的侵入，使其無暇顧及西方及北方廣大國土的保護，在此背景下，俄國屢次在條約中提及疆域問題，以外交手段與武力攫取。

對疆域方面的研究，有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毓澍《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臺北：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1976）、胡良珍編《中俄疆界問題之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8）、劉國興《中俄邊界條約之研究》（1689 - 1881）（臺北：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1973）、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等。《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主要是以研究清季有關中俄在黑龍江流域一帶的界務交涉問題為重心，除因該區中國失地最廣、牽涉國際關係最廣之外，尚著眼於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掠有黑龍江以北與烏蘇里江以東諸地之後，導致中國邊防觀念的巨大改變，其直接結果為東三省地區與華北地區人口流動之加強，間接促成東北邊疆的開發⁷，近代東三省地區之開發，除保證東北邊疆之鞏固，自此成為中國不可分割領土之一部份，並間接產生遏阻俄國勢力進入中國本部的作用⁸；李毓澍所著，《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主要以十七世紀的尼布楚交涉、璦琿條約簽訂以降，數次關於中俄東北邊界的條約交涉以及界碑的劃定為討論中心，並將研究時間延伸至二十世紀以後，到 1960 年之前

⁷ 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5）（臺北：中央研究院，1970），頁 5。

⁸ 同前註，頁 6。

的中蘇邊界問題研究，例如「張鼓峰事件」、，「珍寶島事件」。

胡良珍所編著《中俄疆界問題之研究》，是一較為偏向通論性的著作，主要論述方式是以俄人在華活動的地區，分為東北、北方、以及西北地方為主軸。劉國興的《中俄邊界條約之研究》，旨在探討俄國東向拓展後的三百年間，俄、清兩國的邊疆政策以及演變情形、屢次界約訂立後，中國的損失，與界約締結的前因後果、俄國在交涉的陰謀伎倆等問題。《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該書主要是考訂 1689 年中俄尼布楚約之中所劃定的邊界等問題為重點，作者提出了一些想要解決的關於邊界研究的問題：包括了《中俄尼布楚條約》各種文本的異同及造成歧異的原因、中俄東段邊界的山河名稱、走向、範圍及具體位置，以及關於中俄雙方界碑設置的數量、型制及所在地點，整理中俄雙方的有關檔案及當時或後人的有記載，試圖勘正中外學者有關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的論著的失誤與不足等問題⁹；由於作者運用相當多的地圖與原始史料，還有當時參與談判的耶穌會教士的日記、因此關於雙方邊界的疑義部分的研究都相當詳盡，此外也提到了關於庫頁島的主權問題。總之在中俄疆域問題的相關研究上的成果，集中在從十七世紀以來到十九世紀，俄國對中國東北、西北疆域的歷史與雙方歷次條約之中爭議的邊界問題上作研究，是頗為豐碩的一個研究領域。

（三）中俄條約的研究

在關於清代中俄條約及其交涉的相關研究上，有劉伯奎著《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8）、黃俊彥， 拳亂後中俄交收東三省問題（1900 1902）（臺東師專學報，1978，頁 385 442。收於《中國近代史論集》，第十五編）、劉存寬的 中俄帕米爾爭議的歷史背景（北京：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第 3 期），李滋男著《中俄伊犁交涉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⁹ 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6。

1976)、程文華《中俄伊犁交涉》(收於《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五編,清季對外交涉(二)俄日)、蔡幸真的《尼布楚條約與當時中俄關係之研究(1581-1722)》(臺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民國83年)。

《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推崇伊犁交涉中,曾紀澤折衝於俄人,左宗棠陳兵塞上,以軍事力量支持外交談判的過程,同時強調以史鑑今,俄人對中國領土的野心是不會停止的。拳亂後中俄交收東三省問題(1900-1902),指出關於庚子拳亂,俄人趁機進軍東三省,在交涉過程中,因李鴻章過於主張傳統的「以夷制夷」,傾向給予俄國人好處,始能制衡英、日的做法,與主張利用「均勢」的劉坤一、張之洞有所爭執,使俄人對中國的勒索有所藉口,同時抓住李鴻章個性以及觀念上的弱點而達成目的。並指出東三省交涉的因素,雖然有美、日、英的介入,但是俄國在撤兵協定中堅持保留撤兵條件的規定,終為日後俄國侵略留下伏筆。

中俄帕米爾爭議的歷史背景則指出,中俄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儘管是具有不平等條約的性質,但是迄今仍是中俄兩國對於帕米爾地區邊界的唯一條約依據¹⁰。《中俄伊犁交涉之研究》在研究內容方面,不只對新疆回變以及英國、俄國牽涉的情形做研究,另外還說明關於新疆防務與當時朝野爭議的「海防」、「塞防」的問題;全文重點是在第二章「崇厚赴俄訂約」、第三章「曾紀澤赴俄改約」的部分,論述了原先崇全與俄會商的不得要領,到曾紀澤換回了合理的條約簽訂。指出清廷本身對國際法認識不夠深入,在談判過程中朝臣所爭論的焦點指在崇厚締約如何不當,與應懲罰以示效尤方面,使外國人見識到清廷沒有主見以及國內士大夫識見的不足,以及徒然增加俄人的憤怒與曾紀澤的困擾¹¹,其平實的評語是「武力乃外交之後盾,而外交是解決國際爭端之最佳途徑,二者缺一不可」。

蔡幸真所著的《尼布楚條約與當時中俄關係之研究(1581-1722)》,說明中俄正式外交關係的形成在十七世紀,對於「尼布楚條約」,歷史學者多半重視

¹⁰ 劉存寬的《中俄帕米爾爭議的歷史背景》(北京: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期,頁170。

¹¹ 李滋男,《中俄伊犁交涉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1976),頁117-119。

條約簽訂的結果，未重視中俄雙方關係的變化。滿清初期的邊防政策與明代相似，只是清人對東北邊防較為重視，而俄羅斯常利用西伯利亞發達的水道系統擴張土地，並且逐次建立行政系統管轄。兩國在遠東相遇，逐漸發展外交關係，不過起因於領土的紛爭而導致雅克薩戰爭的發生。中國雖然在戰爭上取得了勝利，但是因為蒙古的問題而使中國想要以正式會談的方式完成交涉。最後尼布楚條約的成功在於雙方政府訓令的底線差距不大，並且都有和談的意願才能順利完成目的。中俄關係自此改變，清廷方面加強邊疆的巡查，而俄羅斯以貿易代替侵略行動，遣使並且進行文化交流，對日後中俄關係影響甚大。

綜合以上對於清末中俄關係研究所作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兩岸有關清代中俄關係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於疆域問題的方面，許多十七到十九世紀的俄文史料以及中國方面的輿地史料被學者提出並加以解釋。另外一方面，研究中俄疆域問題的同時也衍生出許多關於外交、軍事研究的學術著作¹²，

三、論文架構

本文在性質上屬於一綜合性的述論，研究的重心並非一人之生平思想、事蹟，或者是一歷史事件，而是取清代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意即有關於記敘有關俄羅斯歷史、地理，以及以知識份子本身的角度而看俄羅斯等層面來作較為廣泛的探討，故本論文將擇重要內容，即知識份子對俄羅斯討論較多的部份，以及西力東漸以後，知識份子如何融入西洋的觀念而看俄羅斯等方向來撰寫。

在時間斷限方面，筆者取 1842 年，即魏源受林則徐所委，編成《海國圖志》為起始年¹³。因為，《海國圖志》的完成，代表著中國知識份子開始認真的進行

¹² 如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雖是以研究曾紀澤的外交生涯為主，但前半部即以中俄伊犁交涉的歷史事件分析發展經過。

¹³ 他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州志》為基礎，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編成 50 卷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擴充為 60 卷本，次年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問世，魏源吸收該書與其他資料，於咸

了解西方的文化與歷史發展，採取所謂以西洋人認識西洋人的做法，使國人於認識西洋，開始擴大資料範圍，進入新的時代。雖其動機或僅在於以「謂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¹⁴，然而所展現的地理知識涵蓋了各洲國情、西洋各國宗教門派、中西洋的紀年與異同等方面，《海國圖志》搜羅俄羅斯的情勢，認為它「尾東首西，北盡冰溟，遠交近攻，陸戰之鄰」，顯示魏源對俄羅斯的綜合了解¹⁵，至於研究時間的下限設定為 1895 年（光緒 21 年），此年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促使知識份子從主張防俄的態度，轉變成以聯俄制日為主流，故時間的下限以此年為主。

在論文架構方面，第一章的部分，在於先建立早期知識份子對俄羅斯認識的概況，從咸豐年以前的著作做介紹，指出在清中期，當國人開始對俄羅斯產生研究興趣的的起源；其次，以兩個問題為重心，第一，知識份子是如何看俄羅斯的起源，第二，他們注重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重要部分，並逐步說明知識份子對俄羅斯基本的認識。

第二章，延續前文的脈絡，探討知識份子如何看俄羅斯領土擴張，指出知識份子不但認識俄羅斯本身，也從俄國人與四周國家的關係的記載中，顯示早期對俄羅斯認識仍未完整，並替知識份子在 1860 年以前對俄羅斯認識的內容作一總結。次節，以官方文書中，清廷展現對俄羅斯的態度說明咸、同之際，雖俄羅斯對中國的侵略加速，特別又是中國內憂外患更趨劇烈的時期，然而對俄羅斯卻是以被動而屢遭挫敗的方式面對，另外在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上，並未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加以發展，反倒是國人遊歷西方的機會增加，知識分子開始以歐洲局勢的發展看俄羅斯，逐漸形成同、光之後，提出以「防俄」

豐二年(1852)增補為 100 卷本。《海國圖志》內容豐富，記述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軍事和科學技術，乃至宗教、文化等情況，並附有世界地圖、各大洲地圖和分國地圖等。此書的旨意在喚起國人，學習外人的長技，興利除弊，增強國力，抵抗外來侵略。與成書時間相近的《瀛環志略》是中國學者編寫的最早的兩部世界地理著作。

¹⁴ 魏源，《海國圖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敘，頁 5-6。

¹⁵ 同前註，頁 9。

為主的見解的趨勢。

第三章，主要分析同、光之際的知識份子因應俄國的強大所提出有關「防俄」主張的檢討，由敘述其興起的背景，進而觀察到西方的政治環境，取法古代的觀念，面對俄羅斯的侵略，擬聯合與其有利害關係的國家成為聯盟，不過這條路徑是否真的可行，或者只是知識份子單方面的想法，也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

四、資料來源

研究清季知識份子對於俄羅斯的認識，必須對其認識俄國的途徑有所認識。筆者所採用的資料包含：一、輿地著作，即清人記載俄羅斯的地理、風俗、部落分布等直接認識的過程所紀錄的，如《綏服紀略》¹⁶、《異域錄》¹⁷等記載清代前期與俄羅斯正式往來，以及作者親身時留下的記載。除了上述單獨的著作之外，在第一章的參考史料部份中，以何秋濤編成的《朔方備乘》佔的比重最為重要。《朔方備乘》在性質上並非屬邊疆地理考證之著作，其重要性在於採集了早期對俄羅斯認識的史料，包含官方的文書，如 聖訓、平定羅剎方略 等記載，以及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輿地知識，做有系統的分門別類，並且對先前出現的史料做考訂¹⁸。其中記載了秦漢以迄明季的北方部族遞擅

¹⁶ 《綏服紀略》主要為雍正時期，松筠擔任與俄國交涉期間，所遺留下的記載。

¹⁷ 異域錄係康熙五十一年，大臣圖里琛銜命安撫土爾扈特而前往俄羅斯境內，往返所記山川風物之記載，透過此書可以認識俄羅斯境內水文、山川、形勝之分布，以及地方出產、逸聞趣事等，為研究清人對俄羅斯地裡認識的必考之書。今有學者莊吉發予以校注。今人莊吉發著有《滿漢異域錄校注》可供對照。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¹⁸ 又《朔方備乘》的深層用意，後人解釋，認為亦有防俄之意“何秋濤，朔方備乘當時最有盛名，其書大底主於攷定史志之誤，而意在防俄”，但何秋濤本人則未對防俄有更深入的解释。楊鳳藻編，《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 1461。

與各朝著名對北方用兵的將領、清代建立後對游牧民族用兵、通商以及和俄國屢次的盟聘的過程，以及考證北徼的形勢與城邑山水，尤其在有關俄羅斯的部分，相當詳細，足作為對俄國地理有充分認識的史料來源。此外尚有考訂前人著作以及增訂修補之處，如《瀛環志略》、《海國圖志》等書籍，可見此書的學術價值，不僅只在研究早期中俄關係，對中國歷朝與北方的歷史往來與地理知識亦可在其獲得。

其次是由王錫祺所編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¹⁹，其性質與《朔方備乘》大致相同，是屬於輿地性質，但其收錄的著作，包羅作者人數之多，搜羅範圍之廣為前人著作不及。其中有關俄羅斯的記載，不少是屬於私人的遊記，以及增加了許多在 1860 年以後出現的相關史料。在官方檔案的運用上，除了早期的官方往來的記載以外，道咸同三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光緒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等，提供了許多中俄的邊界折衝經過、條約的內容、以及相關的奏摺的資料。由賀長齡、賈禎等人先後編寫與增補的《皇朝經世文編》系列²⁰，的叢書，代表的清季知識份子經世的思想，其中有從外交、軍事邊防、歷史等角度看俄羅斯的文章，且集中的範圍多為光緒年以後，對於分析知識份子在不同年代對俄羅斯的看法，正可作為對比。

五、研究方向

本文所研究之方向大體上以清代知識份子的記載與言論為主軸，所引述的多為一手的記載，或是後人彙編的史料。惟文中有涉及到俄羅斯的地名、人名或者是風俗等詞彙，在記載上不盡相同，必須以對照俄羅斯歷史以及相關書籍

¹⁹ 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據光緒十七年上海易堂影印（臺北：廣文，1962）。

²⁰ 《皇朝經世文編》系列，包含了一編、二編、三編、補編、統編與再補編等多卷，乃由清人賈禎、甘韓、邵之棠等人分別編成。收有許多知識份子對俄國的看法的論述，相關文章的年代多為 1870 年之後，到 1900 年之際，其中又有外交、軍事等分類，故為很好的史料來源，正與其書名“經世”有所關聯。

加以核對，務求錯誤減少。而本文欲求突破之處，經由論述知識份子從最初對俄羅斯認識的層面，由歷史、風土進而在第三章所述，知識份子認為俄羅斯的確是更需要防備之外患的主張，乃為本文的重點。